

杨平 著

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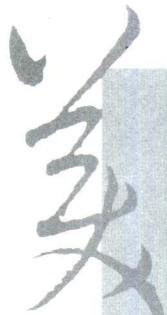
东方出版社



杨平 著

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陆丽云

装帧设计:徐晖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杨平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1

ISBN 7-5060-1613-3

I . 康… II . 杨… III . 康德, I. (1724 ~ 1804) - 美学思想 - 影
响 - 美学 - 中国 - 现代 IV .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955 号

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

KANGDE YU ZHONGGUO XIANDAI MEIXUE SIXIANG

杨 平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 <http://01.peoplespace.net>

E-mail: 01@peoplespace.net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44 千 印数: 1 - 1,500 册

ISBN 7-5060-1613-3 定价: 12.00 元

序

杨平博士又要出书了！他高兴地告诉我这一好消息，并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领命。

杨平是滕守尧教授的高足，与我也有半个师生关系，另一半则是朋友——当然是忘年之交。我与青年同志交往，不愿单以师长的身份，总是板着面孔，总是居高临下，那太束缚我的情性，感觉不自在，而愿以朋友的身份，平等相待，自由随便，感觉是一种解放。两种身份，各有用场：需要严肃的时候，不妨正襟危坐，亮出师道尊严；需要活泼的时候，不妨开个玩笑，幽默一番，增加一些生活乐趣。这正是我与杨平交往的具体描述。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虽不敢自命为君子，但我们的交往确实是向君子看齐的：以文拜师，以文会友，文心相照，遂成知音。古人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则显。世远莫见其面，覩文则见其心。其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文心雕龙》）杨平的研究志趣，正合我的“文心”，因此，我主持的科研项目也聘请他参加，并且完成得很出色。在他读博的三年中，由于频繁的文字交往，我们既师又友，情会理达，教学相长，结下终身难忘的友谊。

杨平同志为人朴实,为学勤奋,在公众面前言语不多,才气不外露。他的导师对他要求很严,一入学就要求他系统地研读中西美学史、艺术史,对西方的东西尽可能去读外文的原典,掌握第一手资料。严师出高徒!我真正了解杨平是在他入学一年之后,他撰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书稿(即现已出版的专著《多维视野中的美育》初稿)送我阅读,征求意见。这本来是他的导师应承的约稿,因当时编撰任务太多,也许是试一试杨平的写作能力而转让给杨平。为此丛书的主编还很有意见,怕影响丛书的质量,我也有此担心。但读了杨平的书稿之后,这种担心便烟消云散。他的新思路、他的独到之见以及那具有哲学意味的文笔,的确使我产生了先睹为快之感,不仅暗自赞叹:“是块好材料!”孟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其中之一。我羡慕他的导师能招到这样的好学生,我也因沾上半个师生关系而自乐。当然,这也不是说那部书稿而且是初稿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出自于一位初试锋芒的青年学生之手实在难得。它的缺点与不足,我也不为友者讳,而是尽可能地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指出为什么要如此修改,让对方也能心服,我觉得如此方不辜负这位谦谦学子。征求意见之后,作者又费了一番工夫,终于交给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和丛书主编看了书稿后,都很满意。杨平用他的研究成果印证了我的赞扬不是无聊的虚夸和吹捧!

现在,杨平又有新的研究成果要出版,这就是《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这部书稿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修改、加工、润色而成。修改后的最终成果,我没来得及拜读。杨平说,只是参考答辩委员们的意见做些修补,没有根本改动,不读也可以

(作序)。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我是认真地读了全篇,也认真地思考如何进一步修改,并毫无保留地向杨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论文答辩会上,我发现自己的看法和其他答辩委员不谋而合或大同小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委员们一致认为,论文很有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表现在选题的新视角和理论的深度开掘。本论文选题涉及两大领域: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国内外研究康德者夥矣,成果也多得汗牛充栋,仅国内十几年来也有多部康德研究专著出版,如此情况下,单纯去研究康德,要想超过前人,谈何容易!如果只是重复别人而无自己的新意,无疑是一种浪费!中国现代美学(即20世纪百年中国美学)研究者也很多,尤其世纪之交这段时间,研究者争先恐后,出版家也视为抢手货,这为后来者提供诸多方便,但也为学术拓展与创新增加了难度。学术研究的对象、领域相对说来比较固定和比较单一,而学术研究的视角、方法则是多元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学术创新往往多从视角、方法入手。视角、方法之新主要表现在选择(如选题、材料的取舍等)、构思(如结构安排、内容详略、主从关系等)、开掘(如思想深度、理论向度等)等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正表现作者选题的新眼光。既不单纯研究康德,也不单纯研究中国现代美学,而是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缩小了研究的范围,确定了研究的“焦点”。虽然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要系统研读康德和中国现代美学,但那是本课题研究的知识准备,而非主攻方向。缩小范围、抓住焦点,是为了向深度开掘。康德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最为深远。从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到如今一百多年,哲学、美学、文艺等领域,到处都有康德的影子。如果作系统梳理和描述,也可

以撰写厚厚一本书。作者的兴趣不在资料整理或历史描述，而在理论建构。他从内涵丰富、关系复杂的研究领域中只抓取三个命题进行论述，即审美无利害性、审美自由、审美人生，可谓提纲挈领。这三个命题对康德美学思想来说，都带有根本性质，是不能忽略的，而对中国现代美学来说，也是从始至今的根本问题，不仅从历史的正面看如此，从反面看也是如此，在极“左”时代，中国现代美学遭到批判的时候，康德的这些影响也是首当其冲，是“资产阶级流毒”、“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主要表现。以上说明，杨平的这一选题是重要的，很有学术价值。当然，要说明本选题的重要和有价值，要依靠作者的构思、论证和开掘。作者围绕这三个命题，经过分析、批判，择善相从，综合出新，并向深度开掘，从而作出新的理论建构，在一片很熟知的研究领域又筑起一座新的论坛。康德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许多是明显的，可以从书本上看到和引证，也有许多是潜在的，已完全溶于中国文化的血液之中，本书把重点放在后者的开掘上，这正表现作者的深刻之处。

记得在论文答辩时，委员们还指出了论文缺点，提出了修改意见，如某些章节应作适当调整，某些论证还不够缜密，某些观点值得商榷等等。我觉得这些意见都有参考价值，虽然瑕不掩瑜，但不进行修改、加工、润色，却难以达到锦上添花的境界。——我相信，谦虚好学的杨平对老师们的意見是不会置之不理的。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希望杨平在学术研究的征途中不停地攀登！

聂振斌

2002年8月28日于农光里坐忘斋

目 录

序	(1)
导论——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性转换 (1)	
第一章 康德美学在中国	(12)
第一节 康德美学的百年东渐	(12)
第二节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接受康德美学概观	(15)
第三节 美学思维方式的转变	(23)
第二章 中国现代美学中的三个康德美学命题	(29)
第一节 审美无利害性	(29)
一 “审美无利害性”概念的历史	(29)
二 他律的艺术与“美学”	(38)
三 审美无利害性与庄禅美学传统的相遇与沟通	(43)
四 审美态度的理论纠葛	(45)
五 艺术独立与审美独立	(58)
六 审美无利害性的现代意义	(68)
七 审美无利害性批判	(72)

第二节 审美自由	(82)
一 康德美学中的审美自由概念	(82)
二 审美的超越	(91)
三 “魏晋风度”中的自由之诠释	(97)
四 美是道德的象征	(101)
五 审美游戏的自由特性	(108)
六 美育的自由理念	(112)
第三节 审美人生	(117)
一 中国“人文传统”的再发现	(118)
二 优美、崇高与古雅说	(124)
三 艺术化人生	(141)
第三章 民族困境中的审美精神	(151)
第一节 美学与宗教的关系	(151)
一 美育代宗教	(151)
二 美学的宗教文化情结	(157)
第二节 中国现代美学的现代性	(162)
一 启蒙何为	(162)
二 美学现代性的双重变奏	(167)
第三节 中国现代美学的学术道路	(170)
一 现代美学的生存论视野	(170)
二 中西美学学术的会通	(174)
 参考文献	(178)
后记	(182)

导 论

——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性转换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西学东渐对晚清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①以西对中，以新对旧，自然产生文化分辨与选择的态度，其中存在着对西学的阐释，西学特征的分析，以及西学价值的判断。正如许地山在评论中西艺术相互影响时所言：“近代艺术正处在意见冲突底时代，因为东亚底艺术理想输入西欧，西欧底艺术输入东亚，西方完全不同的特点，彼此都看出来了。”^②这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参照在学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学术领域，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如何甄别文化的相互影响？其标

^① 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作者详细地介绍和探讨了晚清知识界是如何接受西方学术，以及接受的范围和深度等等问题，从宏观的角度说明西学对晚清社会的深刻影响。笔者以为，这种研究实际上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历史与文化的背景，这正是本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② 许地山：《中国美术家底责任》（《晨报副刊》，1927年1月8日）。

准在哪里?① 摆在研究者案头的是一个个难题。正因为跨文化研究存在各种各样的难题,所以研究者更需要一种学术勇气与学术信念。

正因为难以分清文化接受者与传播者双方的作用过程中谁是主动的一方,我们似乎只能看到双方同时存在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文化碰撞中形成的,传播者——西方美学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中国,与本土的语境结合,进入西方美学的中国化过程,产生不同形式、不同内涵的美学变体;接受者——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种种选择接受了西方美学,并移植到中国以后,使中国美学现代化。总体上看,各种西方学术的新学语的输入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是对传统学问的挑战。学语的输入在最初大都是主动接受,以后才渐渐地被知识分子消化性地解读与吸收。大致的过程是:最初是术语的接受,然后是学术观念的接受,最后是学术思维方式的接受与运用,层次越来越深。不过,引起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注目的是西方那些陌生而新鲜的学术思想资源,在文化选择与文化接受上,这是我们需要首先予以特别说明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视野里,最令人神往的还是那些与传统文化异质的思想;同时异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同质的东西也往往令中

① 乐黛云先生指出过文化影响研究中的难题,她在一篇序言中说:“由于作者是在开辟一个崭新的领域,而且是一个范围如此广大的领域,失误在所难免,况且影响研究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要证实某一作家受到何种影响或者没有受到何种影响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影响,都很难找出确定的准则,某些人看来言之凿凿的东西,在另一些人看来就难免有比附之嫌。”要避免穿凿附会的嫌疑,必须对研究对象的学术经历,学术论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同时还要确定在哪个层面进行比较研究。引文见马立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3 页。

国知识分子心领神会。

反观中国现代美学，自从“美学”与“美育”等新学语输入后，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美学”，这个称谓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是什么呢？在现代中国，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美学”一词的？美学的特殊使命是什么？为完成这些使命，现代美学掌握哪些手段呢？看来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这样一来，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转化提上历史日程，现代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美学观念与思想梳理传统美学与美育思想，预示了美学思想转变的到来。思想与文化的过渡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何况中国近现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代，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潮发展时代。这包括了新概念的吸收、融会、萌芽、蜕变的过程。这种转变逐步瓦解了传统美学的思维方式，瓦解不是摧毁，因为一种思想根本不能扼杀另一种思想。与此同时，美学转变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学形态与美学模式显得异彩纷呈。

就美学形态而言，我们可以这样指称：美学的原生形态、美学的次生形态、美学的再生形态。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皆可以称为美学的原生形态，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美学的介绍与述评则可称谓美学的次生形态，那么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美学观念解释中国传统美学而获得的成果则可称为美学的再生形态。我们认为，美学的再生形态在中国现代美学中最富有原创性和最具有思想史的意义。^①

^① 维特根斯坦有这样精辟的评说：“我们的文明以‘进步’一词为特征。与其说取得进步是文明的特点之一，不如说进步是文明的形态。它的特点在于建筑。它全力以赴地建筑一个更复杂的结构。明确的探讨也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

美学形态的转换,实际上是一个理论范式转换的问题,理论范式的转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最终必须要冲破文化传统的束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获得解放,真正形成一种自觉的理论形态,即美学学科最后达到自身的完满和自主,形成独立的知识系统。在西学东渐中,文化危机感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创新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西方文化理论这另一只“眼睛”,看到了一个个新的理论规则、一个个新的传统。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理解这一文化现象最为恰当不过了,库恩认为一种处在危机中的规范要过渡到一种新的规范,从而形成一种新传统,远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是靠旧规范的分析和推广而达到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按新原理的一种重建,是一种新的理论在改变以往的领域,以及新的规范方法和应用的重建。就理解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转换而言,范式理论无疑具有启迪的作用。西方近现代文化促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新生,在西方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传统美学所存在的问题与危机,中国美学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和言说方式,确立自己的美学形态。由此,中国美学开始从古典美学形态向现代美学形态转化,正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以往的思想范

段,而不是它自身的目的。相反,我觉得明确、清楚本身具有很高的价值。”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页。在本书中,我持相似的立场,那就是,康德对现代美学的影响是不能够全以“进步”来衡量的,最重要的是,康德赋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讨论美学所给予的确定性,以及二者在审美理想上的相通性,这些构成建构中国现代美学的思想基础。对传统美学来说,这些无疑是根本性的。在这里,我所谈论的美学意义上的进步也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常常在进化论意义上所理解的“进步”。

式逐渐消隐，新的学科范式逐渐确立。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转换也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

从外在的转换而言，美学家们致力于西方哲学、美学的阅读、翻译和介绍，西方美学在中国传播得非常迅速和广泛。譬如，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大力介绍西方哲学与美学。同时美学著作与美学教科书起到了普及美学的作用，陈望道著《美学纲要》、《美学概论》，吕激著《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等，范寿康著《美学概论》、《艺术之本质》等等。一系列的美学概论为西方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尽管这些理论还缺乏创造性，但它们相对于传统美学著作来说毕竟有“推陈出新”的效应，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学理层面上。事实上，这种次生形态的美学还不具有原创性。

从内在转换上说，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深沉地反省中国文明，反思致中国落后的根源，并将思想的触角指向文化心理层面，正是在这一反思过程中，西方文化理论自然地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这就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看待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在这一思想潮流下面，美学家自觉地选择、运用西洋哲学与美学理论诠释中国的美学传统。在这一点上，王国维开了引进西方美学理论上的先河，他引进“美学”这一“新学语”，并运用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美学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艺术，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者。尽管现代美学家使用的材料往往是中国的，但是他们分析、理解、阐释它们的方法、观念、理论却是西方近现代的。美学家们以一种开放的精神对待西方美学，在这种情形下，西方近现代的美学思想与思潮都纳入了他们的视阈之内，如康

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移情说、直觉说、审美距离说等等。“正是‘西方’的这种多样性，使人们明确了西化必须是有选择的；一般地说，选择的标准是西方的方式要适合中国的需要，这样，引进的东西能扎下根来并变成中国的东西。”^① 外必须适合内。这种文化观与历史观也适合诠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文化现象。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美学家开始运用西方的理性思维方式来研究美学，从而一改传统重视体悟的形象思维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上看，形象思维、洞观感悟和整体把握始终是中国人的主要思维方式，而不太善于西方那种逻辑推理、解剖分析。王国维对此表述了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特质，是实际的、通俗的；西洋人的特质是思辨的、科学的，西洋人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的一切事物，没有不用综合与分析的方法。中国有辩论而无逻辑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都是中国人所不擅长的。宗白华则在《形上学》中指出中西哲学路线的不同，“希腊哲学出发于宗教与哲学之对立（苏格拉底死于此），两趋极端。而哲学遂走上‘纯逻辑’、‘纯数理’、‘纯科学化’之路线。而‘纯理’界与‘道德界’，‘美界’的鸿沟始终无法打通”^②。而中国哲学家继承政治道德的遗训以及礼乐文化，对政治与宗教不取对立的分裂态度，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于古代宗教仪式、礼乐，欲阐发其“意”，于其中显示其形上（天地）境界。于形下之器，体会其形上

^①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② 《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00页。

之道。“中国哲学终结于‘神化的宇宙’，非如西洋之终结于‘理化的宇宙’，以及对‘纯理’之‘批判’为哲学之最高峰。”^① 中国知识分子精微观察中西思想的根源，以及估量二者之间的差异，体现了他们思考问题的理论深度与广阔的学术视野。现代知识分子正是意识到中西的不同，才会反思传统，这样才会转变乃至改造传统思维模式。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以一种观念化的模式认识、研究美学，并在文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传承、繁衍和拓展。从学科形态上，中国美学由此逐渐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这些转变使得美学学科具有现代意识与人文观念。

在哲学观念上，形式主义美学对传统美学的冲击与改造是明显的，在思维方式上，这种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分析美学问题运用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区分，使用官能的先验划分，这无不打下了西化的痕迹。形式主义美学不单单让渴望西学的眼睛经受了思想的洗礼，同时经验美学也深深地打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的精神与灵魂，西方经验美学更容易与他们在精神上获得直接的沟通与理解，尽管这种沟通也存在单向度的问题。不过文化传统与教育传统根植在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田野之中，无论他们高喊“革命”的口号，还是拒斥传统与消解传统，他们的内心是复杂的，他们内心始终沐浴在传统文化的光芒中。文化背景与文化的框架搭建了现代知识分子理解与解释西方文化的思想平台。因此，如果要问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是怎样开始的？”应该说，他们大都从传统文化开始，同时后来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从他们的

^① 《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 601—602 页。

学术著作中可以发现理论的文化基因。在美学领域,许多知识分子从翻译、介绍西方的理论开始,逐渐受到西方美学的熏陶,逐渐形成自己的美学理论。因此他们的美学理论在形式上也有相似的因素。紧接着的问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期待是怎样的?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心态?他们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皈依是不是就那么单一?他们自己的学术信仰和学术关怀在哪里?在他们那里,中西文化的张力究竟有多大?

不可否认,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论目标是神圣的,他们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对西方美学理论的传播、借鉴与研究,并不是为了摹仿,而是为了创建时代的美学理论,解决时代的社会问题。正是从这一神圣的目标出发,他们广泛而系统地研究、汲取异域的经验,并力求把它同中国传统美学结合起来,创建中国现代美学,为此他们做出重大的理论贡献。

回到本文的主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如果把现代美学家的美学理论全归功于康德美学,这个框子未免大了一点,这肯定是独断论。有一段时间,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论空间以及文化接受视野远比康德美学的空间大得多,但是从理论的深度而言,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论修养远不及康德的水平。现代知识分子对此并不关心,而是实行“拿来主义”。因此进入他们视野的西方美学理论,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一网打尽,拿来不误,尽可能地为我所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康德哲学与美学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浸染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不能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了。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阐释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关系呢?现代知识分子理解、解释康德美学形成一个个独特的文本,